

丁玲创作 独特性面面观

——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

——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

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
——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
丁玲创作讨论会专集编选小组编
责任编辑：黄仁沛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：328,000 印张：16 印数：1—2,000
统一书号：10456·50 定价：3.05元

新书目：85—24

目 录

在丁玲创作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·····	丁玲(1)
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·····	丁玲(2)
在会见厦门大学部分师生会上的讲话·····	丁玲(7)
丁玲在“文讲所”时的一些情况·····	马烽(11)
读丁玲同志的小说随感·····	马加(17)
题外有关的话·····	骆宾基(24)
我所认识的丁玲·····	巍巍(33)
生命之树常青	
——丁玲作品给予我的影响·····	杜宣(39)
丁玲对我成长的影响·····	杨沫(45)
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有感·····	陈登科(48)
三个问题,一个开端·····	峻青(59)
人和文·····	刘真(65)
丁玲与莎菲·····	周良沛(71)
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	
——楼适夷等谈丁玲·····	(82)
致丁玲创作讨论会·····	舒群 杜鹃程 雷加 刘绍棠(88)

- 永不消逝的活力……………郑朝宗(96)
- 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创性……………陈鸣树(107)
- 论丁玲早期创作的悲剧倾向……………郭成 陈宗敏(125)
-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探索性格的女性……………张大雷(142)
- 丁玲抗战时期创作的独特贡献……………钱荫榆(158)
- ✓ 论丁玲小说的现实主义独创性……………王中忱(176)
- ✓ 略谈丁玲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特色……………黄平权(191)
- ✓ 试探丁玲在建国前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……………庄钟庆(205)

- ✓ 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……………徐霞村(216)
- ✓ 丁玲的莎菲和茅盾的“时代女性”群……………丁尔纲(222)
- 贞贞与羊脂球……………蔡师圣(237)

- ✓ 锈损了灵魂的悲剧
 - 论《阿毛姑娘》……………张永泉(253)
 - 《母亲》与丁玲的创作道路……………彭淑芬(264)
 - 丁玲的戏剧观与戏剧创作……………陈世雄(282)

 - 《桑干河上》艺术断想……………孙中田(293)
 - “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、最本质的东西”
 - 谈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主题……………龚明德(313)
 - 也谈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主题……………任伟光(327)
 - 释“变天思想”
 - 浅谈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主题……………宋建元(339)

登高山观日出，在海上看激浪

——丁玲散文的艺术风格……………于河生(346)

丁玲散文风格二题……………姚明强(365)

谈丁玲散文的语言……………何耿镛(375)

几缕馨香

——读《丁玲散文近作选》……………肖云儒(381)

来自人民生活海洋的珍宝……………周勇胜(394)

涌心灵之泉

——丁玲散文近作语言艺术……………孙瑞珍(403)

从《母亲》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看丁玲

创作与我国古典文学的联系……………庄克华(417)

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与中国古典小说……………蔡景康(434)

丁玲的创作与外国文学……………赖干坚(449)

冯雪峰论丁玲创作的发展与特色……………白崇义(461)

丁玲创作研究的今昔……………朱水涌(475)

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与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

时候》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相浦 采(493)

编后记……………(505)

在丁玲创作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

(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上午)

丁 玲

厦门大学召开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，希望我讲几句话。我没有多少话说，只简单说几句，我认为厦门大学是个有优良传统的大学，有鲁迅的革命精神，陈嘉庚的爱国精神。他们的革命的、爱国的思想，在“四化”建设的今天要大加发扬！

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，我是一个普通人。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推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作用。

谢谢大家！

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

(一九八四年六月廿日下午)

丁 玲

我跟会议的主席讲过，不要让我讲话，我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我得知一些同志在讲话中对我的赞誉，我很不安，也感到惭愧。我把这当成大家给我的鼓励 and 希望。

昨天有同志问我过去怎会想写文章的，写过什么文章？我回答说：我没有想过，原来根本不曾想当作家。早期在北京的时候，在座的徐霞村先生可以证明吧。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，徐先生等和胡也频搞无须社，我是不置一词的。当时无须社有于赓虞等一些作家。那时，年轻一些的作家都走了，南下，留在北京的有沈从文、胡也频、于赓虞等人；女作家有黄庐隐、石评梅、陆晶清等；他们经常聚会；徐先生那时到法国去了；我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，因为我没有想要当作家，我没有想要挤上去。我只象一个新战士，想投奔革命。因为，我先前在上海曾经有很好的条件，我的很多老师都是布尔什维克，他们有的要介绍我参加党，参加团。当时我很幼稚，我不愿意做一个浅薄无知的人，我想先读一点书再说。

后来我到了北京，与他们失掉联系，他们都上广东，参加北伐战争去了，想找他们也找不着，没有办法，我搁浅在北京的沙滩上，非常苦闷，这时才拿起笔来。后来在上海，胡也频参加左联，我也参加了左联，但我不想做工作。一九五〇年我在《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》中写了，胡也频的进步是飞跃的，我却是在爬。后来，一九三二年，也频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以后，好心的老师劝我，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了，就写一点文章算了。但我自己却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战士，踩着烈士的血迹，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我只顾冲上前去；结果我就冲上前去了。

回顾我这一生，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可以坐下来写文章的。到陕北的时候，我很想写一部农民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；但是，因为工作需要，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谈：看你能团结人，能做组织工作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那些青年知识分子你都团结得很好。现在你到边区文协去做一点团结工作吧！这样，我把写作放下了，同这个人交朋友，同那个人谈心，做些工作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全国解放了，我初到北京，也是领导同志跟我说：“现在没有合适的同志肯做工作。有的作家有牢骚：‘丁玲有时间写了一本书，周立波写了一本书，我们没有条件’，现在最好你来，来做做工作……。”我原来不想到北京工作，已和东北局商妥，计划在东北写作，所以来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，组织关系都没有带来，只带了一封临时的组织证明信。我留在北京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，这以后的情形，我就不讲了。现在有的老朋友问我，你到底下去劳动了，你是什么心情啊，是否感到有委屈？我说我参加劳动，没有感

到委屈。过去也劳动，在延安也参加过劳动嘛。劳动有什么不好呢？什么人都应该劳动，那么多人都在劳动，为什么我不能劳动呢？在人人都参加劳动的单位里，我坐在房子里是很不安的。我那时的想法也很简单，我想，多则二、三年，两三年后我再回党里来，就可以写作。过去也有很多人被开除党籍，也有的是错案，改正以后不就回来了吗？我们下去几年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！哪里晓得一下去就是二十多年！二十多年来，我在底下劳动工作，做家属工作，做群众工作，觉得也有好处。后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更倒霉了，活下来都很困难，自然不会想到写作。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，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，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。我坐在监牢里的时候，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，在铺板上摆着。摆什么？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：那个地方是鸡舍，那个地点是运动场；要用多少人；饲料队，打鱼队等。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。最为难的时候，我就想：如果陈明每个月能够拿六十元或八十元的工资，我就靠他吃饭，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，就把没有完成的小说写一写，不管写得好不好，藏之名山，没有名山就藏之抽屉里，将来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，等我的儿子或孙子们帮我拿出来出版罢。

这几年来，我为什么把想写的长篇小说搁下来了呢？这部小说是从一九四八年就想要写的，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年，这中间实际搁笔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写作时间；至今还没有完成，反而写了四五十万字的其他文章。近年来，我写了一些散文，还有一种不算散文的杂文，也许是胡说八道吧。我在

那里发表了很多议论，反对一些东西，赞成一些东西。现在我要写我自己要写的，我要写自己一生中重要的几段，写一、二本书。许多外国人常常打听，朋友们，文学研究工作者，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关心地问我：你在南京怎么样，你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在那里为什么拿那么多的钱？为什么国民党不杀你？你为什么那么“自由”呀？现在我要写，我要把这一“宝”揭开，让关心我的同志们、朋友们放心。我要写的另一本书是《风雪人间》，我要写我在北大荒的十二年，加上坐牢的那五年。我要写我所遭遇的风雪，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间温暖；就是因为有人间的温暖，才能抵抗住这样的风雪。有的人希望我跟他谈一谈，他来描写我这一段。其实我自己写，不会有任何困难；旁人来写，却不容易，因为旁人没有那样的遭遇和感受。这次你们讨论我的创作，给了我很多夸奖，我是受之有愧的。我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也不是那么了不起，我无非就是一个当兵的，当了一辈子的兵，是文艺战线上的战士；需要战斗到什么时候，就战斗到什么时候。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兵。前两天，有一个同志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；但是我不想当将军，我怕当将军，当将军太麻烦，我没有那样的兴趣，我永远是普通一兵。你们讲了很多好话，我听了除了惭愧以外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欢喜。但是，我感谢你们，我觉得你们说我的好话，着眼点不在我个人，着眼点是在我们的文学，我们的文学通路，在我们党的文学事业上。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，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，因为我已经八十岁了。你们把八十岁当好事，我们把它当坏事。如果现在我是七十岁，六十岁该多

好？八十岁，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。你们祝愿我长寿，怎么能长寿呢？长不了多少了。（大笑）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。

我很感谢厦门大学。厦门大学举行的这次会议，不仅仅是要评论我，讨论我，而是通过评论我的创作，在党的文学事业的发展方面总结一点经验，得到一些借鉴。所以，为着革命文学事业更加发展，我感谢他们。厦门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很有魄力的。

我也感谢你们大家在这种热的天气，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会议，如农垦局的郑家真同志从佳木斯坐了六天火车赶到这里，太辛苦了。

我的话完了，谢谢大家！

在会见厦门大学 部分师生会上的讲话

(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在厦大人防礼堂)

丁 玲

刚才听了秦兆阳、马烽、陈登科三位同志的发言，觉得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：他们都把最好的年代，美丽的青春献给了革命，他们都是从民族、民主斗争的烽火中滚出来的，他们的作品都是表现人民生活与斗争的。他们和你们现在大学生不一样，你们有老师指导，能够广泛地接触文学名著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，应该珍惜。马烽同志只读了小学，陈登科同志也只读二年书，秦兆阳同志念过师范学校，他们参加革命后，都很刻苦学习，不断地提高文化素养，同时又跟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，这是他们创作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。马烽同志长期在农村中生活，一直是写农村生活的。解放后他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当支部书记，还做其他行政工作；每年要抽几个月时间到农村去，写了一些小说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担任山西省文联主席，仍然经常到农村去。你们

看他很象一个农村的老汉。陈登科同志发表《活人塘》、《淮河边上的儿女》等小说后，很受群众的欢迎，后来有一次，象他自己刚才说的，他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，写了一篇有缺点的作品。我看了非常痛心，对他说：“你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”当他的《黑姑娘》发表后，我高兴地对他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又回到了你原来的道路上来。”写自己熟悉而又有意义的东西，这是作家创造出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不可缺少的因素。

有意义的作品，经常是同正确地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斗争有关的。在座的魏巍同志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写战士和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，在当时影响很大，至今仍然受到赞扬。杨沫同志的《青春之歌》写的是“一二·九”学生的爱国运动，抓住了一代青年人革命激情，所以也能流传至今。

写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，这是我们革命文学的传统。在座的楼适夷同志，早年参加革命，写过很有名的作品，如《盐场》；后来加入左联，扛着大旗同国民党斗争，表现很勇敢。骆宾基同志解放前写过长篇《边陲线上》、短篇集《北望园春天》等，对当时的革命斗争都发生过很好的作用。

有人反对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，这是站不住的。我刚才提到的几位作家的成功作品，在解放前或解放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如果否定它们的政治作用，那是说不通的！

我们的作家都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写作，为人民工作的。秦兆阳同志解放后写过《农村散记》、《在田野上前进》等出色的作品，这都是他在工作之余写出的，他的大量时间是在从事编辑工作。五十年代，他担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；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主编《当代》，他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，发现

和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。现在有少数刊物的负责人不愿做具体工作，不看稿，不改稿，老是支使青年人，更有的刊物只是刊登所谓关系户作者的文章，对于群众中的来稿，很不重视。在座的蒋锡金同志编过许多刊物，写过很多作品和评论；现在当了教授，培育了很多人才，例如写过《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》的王中忱同志，就是他的一个学生。

作家要为人民工作，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。陈登科同志刚才谈了他的创作经历，大家很欢迎，都喜欢听。从他的讲话里，大家可以看出陈登科同志是党培养出来的，他为人朴实，幽默，有着作家的敏感，有点侠气。他现在是安徽省文联主席，工作是有成绩的。我希望我们当文联主席的人，都不要单纯地满足于传达上级的指示，满足于做官，而要努力同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，倾听人民的意见、要求和希望，成为人民的代言人，要记住自己是人民的作家，要为人民创作更多的好作品。

有人说：“作品是扯出来的。”我不赞成这种说法。文学创作是艰难的，不是单靠“碰”和“闯”或“扯”就出来的，而是要用心，动脑筋，到人民生活中去，提高对生活的认识，对生活的理解，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。我们过去写的好多作品不就是从人民生活中汲取源泉的吗？难道是“扯”出来的！

当前文学界最需要的是批评。现在缺少批评的风气，只会捧，不是捧作品，而是捧人，说好话。有的刊物，就有这种毛病。骆宾基同志写过很多好作品，刊物上很少发表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。魏巍同志的《东方》写得深，但影响不如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这同文艺界对《东方》的评论很少有关。

好的作品就得有组织地加以评价，才能扩大影响。

提倡写社会主义新人，这自然是对的。但如果把社会主义新人只看作是一些老实人，而不写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，他们的模范行为的新的特点，那怎么能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作用？

我们的文学需要表现理想，这首先就要求作家自己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。左联时期，我们都很幼稚，然而我们却怀着理想，憧憬未来；我们胜利了。徐志摩我是熟悉的，他读的古书、外国书比我多，文学修养也比我高。但我不追随他们，我选择了革命的道路，后来证明我们走的道路是对的。文学史家为了研究新文学流派的发展历史，自然也要研究新月派。又如新文学是同鸳鸯蝴蝶派斗争过来的并取得胜利，自然我们并不一概否定，鸳鸯蝴蝶派中也有较好的作品。研究现代文学，当然也要研究鸳鸯蝴蝶派，但有的出版单位不加区别，大量翻印他们的作品，革命文学在这些出版者的眼中不吃香，这些都是怪现象。

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青年人缺乏理想，只想钱，想物质享受，想个人安逸，我们应当通过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消极现象，引导他们为“四化”贡献自己的青春！

发扬文学同人民密切联系的好传统，批评文学脱离人民的现象，我们文学就大有希望。

丁玲在“文讲所”时的一些情况

马 烽

我非常感谢厦门大学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盛会。按理说，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，因为会议内容是讨论丁玲创作，而我对她的作品并没有全部读过，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。虽然我觉得她有些作品写得很好，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，但我并不热爱，老实说，我倒更喜欢读老舍、赵树理的作品。这一点很容易理解，正象吃饭一样，大米虽然好，可我不愿意吃，各人有各人的胃口，没有必要强求一致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为什么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呢？我认为讨论丁玲创作，不仅仅是丁玲个人的问题，实质上是在探讨老一代革命作家所走过的创作道路。这是有益的事，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另外，厦门远离内地，濒临大海，会使人开眼界，这也是很吸引人的。会议主持人再三要我发言，我只好说点题外的话，谈谈和丁玲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中所了解的一点情况。也许对研究丁玲作品的同志有点参考作用，我没有发言稿，只能采取聊天的方式，说到那儿算那儿，想起什么说什么。